

背上的文化

——大汶口文化红陶背壶

◎崔斌

陶背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特有器型,属于汲水器类。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多为泥质或夹砂的红陶,也有灰陶和黑陶,一般素面无纹饰。

背壶的造型基本是壶形,不同的是壶腹不是圆体,而是一侧扁平一侧圆鼓,肩下有耳穿,鼓腹下部有喙形或鸡冠状的凸钮。目前所见的背壶在造型方面没有多大区别,只有高矮胖瘦之分。从背壶半圆形壶腹和肩下耳穿的造型安排来分析,应是人们出行时背在身上的水具。

大汶口文化时期,虽然是以原始农业为主,渔猎业也占相当的比重,人们无论从事哪种生产活动,体力消耗大,出行时需要补充水分,随身携带水壶是十分必要的。然而,至大汶口文化晚期,陶背壶的器型越来越小,甚至失去了实用功能,而且多数出自墓中,使人想到在各类器具纷纷随葬的风气之下,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当然不会被人忽略,用于背水的陶背壶成为明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

潍坊市博物馆的这件大汶口文化红陶背壶,口径11.6厘米、底径7.2厘米,高25.5厘米。距今6100至4600年。泥质红陶,外表有红色陶衣。溜肩,深腹;肩腹部和耳有红色彩绘,肩部饰一周重叠的三角形纹,下部饰两两对角的三角形纹两组。现纹饰已模糊不清,只可从痕迹上去想象当时的纹饰了。壶的腹部很有特色,一面鼓腹,另一面扁平,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环状耳。鼓腹中部与扁平面相对的部位还有一个凸钮。有这个鸟喙形的凸钮,可将背绳套在凸钮下,穿过双耳,背起背壶。

彩陶,一般是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,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,用赭石和氧化锰等作为呈色元素,然后入窑烧制,最终在橙红色的胎体上呈现出赭红、黑、白等色的美丽图案,纹样与器物造型高度统一,达到装饰美化的效果。

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,灰陶和黑陶的数量较少。后来彩陶颜色种类增多,除了黑、红两色外,还出现白、褐、黄三色;纹样图案的色彩组合上,出现两种及以上颜色的复彩,以地色不同可分为原地、白衣地、红衣地和褐衣地。构图手法和形式多样化,除了对称、错位、连续、反复外,着色层次上还出现了三层彩绘成的花纹;注重色彩对比,纹样图案亮丽,白色运用较多;阴阳花纹在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颜色种类主要有黑、红、白、褐四色,以黑彩数量最多,黄彩极少见。纹样图案仍以复彩为主,有四种地色类别,其中红衣地较流行。构图布局条带化,不同的图案之间巧妙地利用某些部件,从而使全图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,不可分割,不同风格的纹样图案同时并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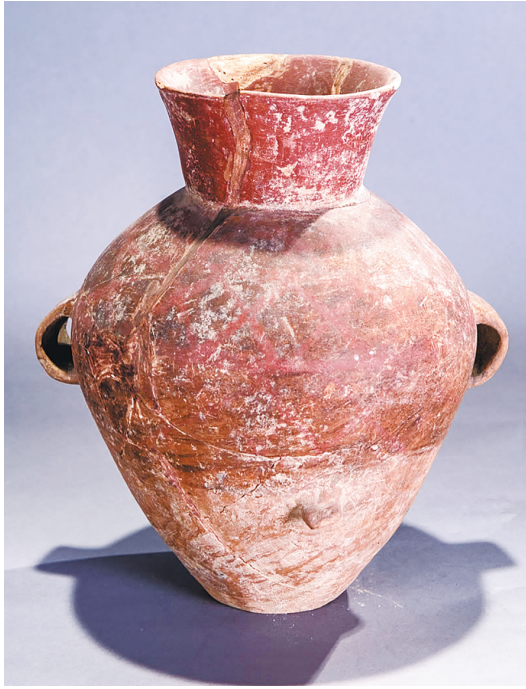
潍坊市博物馆的这件是泥质红陶,为纯粹泥质的,还有种“夹砂陶”的陶器。烧制陶坯时,特意在陶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砂粒和其它碎末,陶坯受热就不易裂开。原理为:陶胎含砂,能提高陶器耐热急变的性能,耐高温、焙烧下不变形,而且制成的陶器再次受热也不碎裂,可作炊器。

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,使用泥条盘筑法的成型方法,轮制成型技术已普遍使用。比如:1985年出土于青州市郑母镇王盘石村的红陶黑彩壶,为大汶口文化的遗物,泥质黄陶,上施红色陶衣,侈口,鼓腹,上饰对称的捏塑扁小耳,下腹收敛,小平底。这件器物从制作到彩绘工艺都较粗糙。这是因为当时这种彩陶器多系手工制坯,经慢轮修整。它代表着当时的陶器制作水平,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既注重实用又讲求美观的思想。

从纹饰上来说,陶背壶也是较为丰富多变的,有着地域的差别。如山东博物馆收藏的陶背壶,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墓中随葬品,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。泥质灰褐陶,素面,壶口沿涂朱色,耳、钮处饰朱红色圆点。河南省鄆陵县文物管理所从鄆陵县彭店乡古城村征集的陶背壶,泥质红陶,通体磨光,绘黑彩,颈下饰两组三周弦纹,其下分别绘不对称的网纹和线纹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邳州大墩子遗址大汶口垂弧纹背壶,用紫红彩在肩部绘复线连弧纹,腹上部绘斜线网格纹,下部绘复线连弧垂挂纹。

尤其华丽的,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彩陶背壶。1959年出土于泰安市大汶口墓地,红色、高领、圆腹、平底。壶面施彩,图案绚丽。它先以黑彩描绘出花纹,再用白彩在黑彩上勾勒轮廓。图案由上至下分别形成纹饰带。最顶部绘黑白彩同心圆。肩部由平行线构成图框,内填多个黑地白彩涡纹。腹部饰三角纹,正反交错排列,构成连续的纹饰带。底部绘联珠纹,在黑地上加白点。在鼓腹中部与扁平面相对的部位还有带横向穿孔的小钮。这个小钮的特别之处就是穿孔,是空心的,具有了穿过绳索,增强背负稳定性的意义。

背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特有的水器,可以盛水或用来汲水,固定在背上,行走时不用担心壶内的水溅出或倾覆。背壶腹部的一侧面加工成扁平造型,扩大了壶身与人体接触的面积,既增加了稳定性,又避免了鼓腹对人体的压迫,在实用性与舒适度方面都进行了创新。



△潍坊市博物馆的大汶口文化红陶背壶。(资料图片)



北宋矮松园和青州州学的辉煌

◎王岩 文/图



△松林书院,宋代称矮松园。(资料图片)

青州,号曰“东夏都会”“海岱名都”“两京通衢”“三齐重镇”。矮松园位于宋代青州城西南,是松林书院的前身,著名的“三元”宰相王曾青少年就读于此,后官至宰相,矮松园名声大振。1031年,罢相知青州的王曾在家乡大办州学,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,办学十分兴盛。

“三元”宰相年少就读于矮松园

松林书院的前身名曰矮松园,其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。宋初,宋太祖以武力夺得天下后,希望偃武兴文,巩固统治,因而大大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。然而,在宋初八十年间,除国子监和太学外,作为养士之所的书院却基本处于废弛状态,士无所养,这就为书院的兴盛提供了契机。书院成为解决官学不兴与士有所学矛盾的关键。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朱祖谦在《白鹿洞书院记》中说:“国初斯民,新脱五季锋鏑之厄,学者尚寡,海内向平,文风日起,儒先往往依山林,即闲旷以讲授,大师多至数十百人。”明代李南素在《重修莲溪书院记》中说:“书院即家塾也,古无是名,至宋始盛。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民间的书院特别是满足私人教育需求的家塾式书院应运而生,矮松园便是这样一所书院。

矮松园位于宋代青州城的西南隅,园因奇诡二松而得名,有着宽广的馆舍,是一处著名的书塾。王曾晚年来此青少年时读书处故地重游,感慨万千,所作《矮松赋并序》开头说:

“齐城西南隅矮松园,自昔之闲馆,此邦之胜概。二松对植,卑枝四出,高不信寻,周且百尺,轮囷偃亚,观者骇目,盖莫如其年祀,亦庸记夫本源,真造化奇诡之绝品也。”

矮松园究竟建于何年,因史料缺乏无具体考证。但有记载的是,王曾青少年时就读于此,他于北宋咸平四年(1001年)参加了青州州试,夺得“解元”;咸平五年(1002年)春,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省试,成为“会元”;是年三月,参加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,一举夺得“状元”。王曾连中“三元”,官至宰相,清正廉洁,政

绩卓著,封沂国公,时人遂于园中筑“王沂公读书台”以志纪念。今人用公元1002年作为矮松园办学之始,是为纪念王曾中状元这一颇富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,其实矮松园作为书塾存在的时间当在王曾中举前若干年。

王曾创办青州州学

王曾39岁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,为副宰相;45岁加封中书侍郎,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拜集贤相,为宰相;48岁拜昭文相,为首相,朝廷倚以为重。天圣七年(1029年),52岁的王曾因主管的玉清昭应宫失火得罪太后而罢相知青州。王曾清明治政,敦励教化,尤重倾力兴学;他捐薪助学,把家中大量藏书捐献给母校。据《厚德录》引王子融《沂公言行录》载:“凡四镇所至,悉兴学校,辍奉钱以助其费。青州仍出家藏书籍卷甚广,以助习读。”任职青州期间,他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创办青州州学。

王曾去世后,泰山书院的创建者、宋理学先驱石介作《青州州学公田记》一文。此文是庆历元年(1041年)石介受青州知州赵概之托,为青州州学扩建成功而作的一篇纪念性文章。文章叙述王曾当初创办青州州学成功,十年后赵概在青州南阳城选取空地扩建州学,推择青州推官蔡宣监督,最终“不烦于府,不扰于民,和悦而以成”。州学公田经费充足,办学兴盛,育人之道备受赞誉。文章赞扬王曾建州学是立本之大事,并对州学办学理念、教学内容、学习方法等多有阐述。

石介曾创泰山书院,但徕书院,以《易》《春秋》教授诸生,“重义理,不由注疏之说”,开宋明理学先声,号称徕诸先生,“泰山学派”创始人。关于“理”“气”“道统”“文道”等论对“二程”、朱熹等影响甚大。和孙复、胡瑗提倡“以仁义礼乐为学”,并称“宋初三先生”。著有《徕集》二十卷。

《青州州学公田记》记录了青州州学的几点很重要的信息,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第一,青州州学办学规模之大,前所

未有。宋代的青州为京东路(后为京东东路)中心所在,而青州州学具备了省级最高学府的规模。王曾建成州学,天子亲赐学名“青州州学”,建房120间。十年后房舍达265间,这些房舍除去学习,生活场所,还有出租之用,其办学规模之大,非明清时期青州府学和县学等所能比。

第二,朝廷赐学田并形成制度。州学规模大,办学经费自然巨大,朝廷划拨土地三十顷作为公田,即学田,这些学田一般用出租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法维持学计,当然也出租一些房舍收取租金,这些都是学校的主要经济支柱,对州学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。学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,直接影响了书院及官学学田制度的建立。

第三,王曾把教育当成根本的大事来抓。纵观历史,凡是政绩突出的官员没有不重教育的。不仅在青州,王曾每到一处做地方长官,便在那里兴办州学,并拿出薪俸捐资助学。明道二年(1033年),王曾任河南府通判时,在河南建起了府学,深受当地民众称赞。景祐二年(1035年),朝廷敕西京重修河南“太室书院”并赐额改称“嵩阳书院”,“王曾奏置院长,给田一顷供膳食”。景祐四年(1037年),王曾到郢州,建起郢州州学,即使病中,也不忘学校建设。石介在《题郢州学壁》中写道:“沂公之贤,人不可及。初罢相,知青州,为青立学。移魏(指河南府),为魏立学。再罢相知郢州,为郢立学。而罢相为三郡建三学。沂公之贤,人不可及!”

第四,教化有方,理念先进。青州知州赵概善用《易经》教导学生:“大畜”卦教人蓄德养贤;“颐”卦教人颐养正气;“需”卦指导弟子饮食修养,不陷入饮食的诱惑;“兑”卦象征喜悦,是说君子应当乐于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研讨学业,讲习道义,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,要舒展张扬人的个性,而不能压抑个性陷入困境;要做“善教者”,方能“优游而至道”,而“不善教者”性情急躁强人所难,其要领贵在“劳逸之节”;教育师生“一弛一张,文武之道”。石介强调“张而不急,弛而不废”,“岁有田,日有饩,劳有休,怠有养”,适度的休闲和休憩,才是“一张一弛

之道”,等等,这些都很好的体现了青州州学先进的教育理念。

第五,学习内容文道兼修,学习方法强调勤奋。青州州学学习内容是广博的,既要修习儒家“六艺经传千万言”,又要修习儒家“仁义礼智,忠信孝悌”的伦常之道,还要探求“天地阴阳,星辰灾变之动”,这与后来松林书院教育的核心精神“崇儒重道”一脉相承。学习方法上强调勤奋:要按时诵读,才能有大的功效;按时探求,学业才能广博。要“蚤(早)起夜诵,寒暑不废,衣冠不解”,“勤苦而后能成”。这些至今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另据光绪《益都县图志》记载,青州和兖州最先创办州学,天圣九年(1031年),应知州王曾的请求,皇帝颁赐青州州学“九经”,自此,凡州郡立学者帝赐“九经”遂成制度。仁宗下诏,全国各州要以青州为榜样,大力兴办州学。“濂洛关闽”分别指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——濂溪先生周敦颐,家居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,家居关中的横渠先生张载和讲学于福建的朱熹。从记载看,皇帝颁赐“九经”,青州州学用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来教化诸生,成为宋代理学的滥觞,对于理学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。

从矮松园到青州州学,教育趋于规模化、官学化,极大促进了青州地区乃至整个山东教育的发展。其实,几乎在同时期,全国不少书院改办州学。如景祐二年,著名的应天府书院改为应天府学,赐田十顷,又于庆历三年(1043年)改为南京国子监,地位更高于一般官学;同矮松园大致同时期创办的湖南衡州石鼓书院,于景祐三年(1036年)改为衡州州学。书院研究者邓洪波认为,当时“州学和书院的称呼不是很严,抑或二者混用”。因此南宋乾道年间范成大游石鼓书院时称“谒石鼓书院,实州学也”。庆历四年(1044年)后,宋王朝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,诏令各州县皆立学,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。宋人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:“及庆历中,诏诸路、州、郡皆立学,设官教授,则所谓书院者尝合而为一。”据此推测,王曾少年读书时的矮松园,在后来官学运动历史大潮的裹挟之下,很可能被其晚年创办的青州州学合而为一了,只是称呼不同罢了。

黄庶的感慨和赵抃的劝学

皇祐五年(1053年),著名书法家、诗人黄庭坚的父亲黄庶始任青州通判,他在携妻子和年幼的黄庭坚游矮松园后写诗《携家游矮松园》,感慨道:

矮松名载四海耳,怪怪老笔不可传。左妻右儿醉树下,安得白首巢其巅。

可见矮松园在王曾中状元50多年后仍然名闻天下,令人流连向往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,参知政事、资政殿学士、著名的“十三贤”之一的赵抃出任青州知州,视察王曾母校,写《青州劝学》一诗,鼓励学子们勤奋攻读:

学欲精勤志欲专,鲁门高第美渊濂。文章行业初由己,富贵荣华只自天。

一簪为山先圣戒,寸阴轻璧古人贤。沂公庠序亲模范,今日诸生为勉旃。

“渊”指颜回字子渊,“濂”指闵子字子骞,两人都是孔子弟子。“沂公”即王曾晚年封号沂国公,“庠序”指古代学校,“沂公庠序”既可理解为为王曾的母校矮松园,也可理解为后来由王曾亲自创办的青州州学。诗歌勉励年轻人要追随随礼门圣贤,精勤立志,珍惜光阴,以王曾为榜样,勤于积累,淡泊富贵,刻苦攻读,修身养性,努力完成学业;也能从侧面看出,当年的青州州学,办学兴盛不衰。

清鲠忠实的尚书赵鉴

◎王鹏

征求意见的基础上,创立了丁田相折法,按照这套办法,有效减轻了贫民的税赋,还增加了全县的整体税收,受到明宪宗的赞赏,皇帝还下令要求各县仿照执行。值得一提的是,张居正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及清朝雍正时期的“摊丁入亩”政策,均是在赵鉴的丁田相折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充实、完善和发展,可以说功在当下,利在千秋。

明正德初期,宦官刘瑾专权,结党营私,任人唯亲。赵鉴在地方上成绩斐然,却不屑与刘瑾一党为伍,朝廷曾多次要征调他进入都察院任职,都遭到刘瑾一党的阻拦。此后,赵鉴先后调任

安庆府(今安徽安庆)知府,顺德府(今河北邢台)知府,在此期间,赵鉴尽自己的最大努力,用宽容柔和的政策保护百姓不被刘瑾一党的苛政所伤害,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

赵鉴执法重在“秉公”二字。宦官刘瑾被诛杀后,赵鉴接连受到提拔重用,后来清查刘瑾余党的任务也交到了赵鉴的手上。因为此前刘瑾曾三番五次阻碍赵鉴提拔,一众余党怕赵鉴打击报复,都非常惶恐。然而,这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赵鉴详细了解了刘瑾一党的所作所为后,对被胁迫作恶的人给予了从宽处理,维护了大局稳定。

正德十四年(1519年),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,史称“宸濠之乱”。由于叛乱牵连皇室贵胄和宗室子弟众多,叛乱平息后,时任大理寺卿的赵鉴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,向皇帝建议严格把握打击范围,只严厉惩治参与叛乱的首恶和要犯,对于被株连的人则网开一面,避免滥杀无辜。最终,在他的极力争取下,被株连的200多人得以活命。

历览赵鉴的一生,年幼穷苦而不投机钻营,从政后屡受排挤却不自暴自弃,手握大权后没有挟私报复,为官的多半时间从事司法工作又不带一丝戾气,由此可见,“清鲠忠实”的美誉并不为过。